

# 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心理影響、求助行為與體制背叛感\*

王麗容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黃冠儒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校園性侵害近年來獲得許多關注，國內外皆開始重視此議題的嚴重性以及校方的處置狀況。校方的不當作為可能導致受害者的體制背叛感，使性侵害創傷更加惡化。本研究利用網路問卷調查全臺灣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生）的性侵害受害現況，以及性侵害的心理影響、求助行為與體制背叛感。在 617 名學生中，有 34 名（6%）在上大學後有性侵害受害經驗，其中加害者多為校內、男性，受害者則沒有性別差異。在心理影響方面，性侵害受害者有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也有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在求助行為方面，有 70% 的受害者曾經尋求身邊親友協助，但僅 23% 尋求正式管道協助，而對於校園通報體制的認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體制背叛感方面，受害者最常感受到難以通報自身經驗、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以及校方否認自己的經驗，但體制背叛感與心理症狀之間的關聯仍有待更多研究。在此脈絡下，大學校園必須負起預防與處遇性侵害事件的體制性責任，以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與生涯發展。

**關鍵詞：**心理創傷、性侵害、校園性侵害、體制背叛感

---

\* 1. 本文通訊作者：王麗容，通訊方式：wanglr@ntu.edu.tw。

2. 本篇論文獲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6-2629-H002-001），僅此誌謝。

2016年，臺灣發生一起大學校園性侵害的爭議事件，受害者質疑系上師長在事後處理過程中的言行態度不當，造成當事人的二度傷害，獲得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也讓大家開始反思校園性平事件處理機制的適切性與困難點。儘管該案件隨著進入司法程序告一段落，但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的反省不能停止。2004年所制定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各級學校應該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除了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也被賦予獨立調查及懲處校園性平事件的重大任務，且調查工作不因進入司法程序而改變（陳惠馨，2005；焦興鎧，2007）。該體制經過十幾年的實踐，許多實務上的問題也浮上檯面（陳慧女，2016；廖珮如，2017；羅燦煥，2014），若從受害者的觀點出發，可以發現很多時候體制對於個人的二度傷害，可能並非來自體制的惡意，而是源自於對受害者需求的不理解與不重視。在處理校園的性別平等事件時，必須從受害者自身的觀點出發，了解性侵害經驗對於受害者的影響，受害者在求助過程中的認知與感受，以及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

大專院校對於性侵害受害者的處置狀況，並不是臺灣獨有的問題，美國政府近年來也十分重視校園內性侵害的議題。2014年，美國白宮發表了一份國家級的報告，強調針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校園氣氛調查」（campus climate survey，即針對校園的性暴力等現況進行調查）以及性暴力預防宣導措施的重要性，並指出校方必須對校園性侵害事件的發生與處置負起責任（White House, 2014）。全國性研究報告也指出（McCaskill, 2014），美國多數的大專院校未能提供受害者足夠的幫助（例如，通報的比例偏低、未提供受害者應有的協助、相關人員缺乏訓練與知識等），他們因此建議校方必須以體制性的觀點，檢討校園性侵害事件中處置方式不理想的問題。然而，目前臺灣針對校園性侵害議題的普遍性、特性以及心理影響的研究十分有限，更缺乏針對校方不當處置的情況及其負面影響之研究。

有鑑於校園性侵害議題的重要性，本研究針對大專院校學生進行網路問卷，除了希望了解臺灣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害現況與心理影響，也希望從受害者的觀點出發，探討他們向校方求助的經驗與意願，並進一步探討校方不當處置的情況及其負面影響。以下將從三個部分進行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首先，本研究會先回顧國內外對於校園性侵害盛行率與心理影響的文獻。接著會討論性侵害受害者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求助行為，以及影響求助行為的因素。最後會討論如何用體制背叛觀點探討校園性平體制對受害者的影響，並提出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範疇。

### （一）性侵害盛行率與心理影響

國外研究指出，大專院校的肢體脅迫型的性侵害（forcible rape）盛行率約1%到9%，而受害者喪失意識的性侵害（incapacitated rape）則2%到14%（Fedina et al., 2018），如果考慮猥褻行為在內的非自願性經驗（unwanted sexual experiences）則通常有高於20%的盛行率（Fedina et al., 2018; Mellins et al., 2017），可見在國外性侵害在大學校園是個普遍的問題。許多研究指出，性侵害的加害者多為男性，而女性大學生比男生有較高的受害風險（Conley et al., 2017; Hines et al., 2012; Mellins et al., 2017）。相較於異性戀大學生，非異性戀也有更高比例的人有受害經驗（Ford & Soto-Marquez, 2016; Mellins et al., 2017）。國內並沒有直接針對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害盛行率進行的研究，但王麗容等人（2012）針對全年齡層進行的全國性調查發現，約有1%的人有性侵既遂、3%有性侵未遂的經驗，而女性的受害比例為男性的兩到三倍。王麗容等人（2012）的調查發現，成年前期比起其他年紀更容易成為暴力受害者，因此可以預測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害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由於過去研究的缺乏，本研究的目標之一就是了解臺灣大專院校性侵害的現況。根據上述研究，本研究預期：相較於男性，女性學生的性侵害受害比例較高；相較於異性戀，非異性戀學生的受害比例較高。

過去研究發現性侵害會造成嚴重負面的心理影響（如長期的憂鬱、焦慮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藥物濫用的問題以及自殺的企圖（Black et al., 2011; Campbell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14）。同樣地，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不只會產生更多的憂鬱、焦慮、創傷症狀，也會造成睡眠障礙以及性方面的困擾（Smith & Freyd, 2013），也會造成受害者校園安全感的喪失（Rosenthal et al., 2016）。除了事件本身，事件後他人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受害者的心理適應。Ahren（2006）深入訪談八位性侵害受害者，發現所有受訪者都曾身邊的人被責備，身邊的人提供的好意建議或支持也常常反而是幫倒忙。Peter-Hagene 與 Ullman（2015）針對1863名性侵害受害

者進行的調查發現，責備或汗名的言論等負面社會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有中度正相關，而情緒支持等正向社會回應，除了有助於受害者進行良好的情緒因應、也能夠提升其覺知控制感。負面的求助經驗可能降低大學生對於社交或進一步求助的自我效能，進而產生更嚴重的心理症狀（蘇素美，2017；Ahren, 2006）。如同文後所述，受害者的創傷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而是不同層次的個人、體制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其傷害與復原的程度，其中涉及自我、他人、組織或是文化對於性侵害事件與受害者的反饋與看法（Campbell et al., 2009）。

國內研究也發現性侵害受害經驗可能會造成負面的創傷等負面心理影響（例如，周雅淳，2002；施安吟，2002；陳慧女、盧鴻文，2013），但此類研究大多都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也缺乏比較性侵害受害者與非受害者經驗之量化研究，僅有少數針對性騷擾事件（彭秀玲等人，2015）或是兒童性虐待創傷的研究（楊思芳、丁原郁，2017）。彭秀玲等人（2015）針對 642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 480 位（80%）有曾遭受性騷擾的經驗，其中女性的受性騷擾的次數可以預測創傷與憂鬱症狀，而男生則沒有此預測力，顯示性騷擾經驗對女性似乎有較大的負面心理影響。然而，就筆者所知，國內過去並沒有性侵害受害者的憂鬱、焦慮等心理症狀的量化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標之一是比較性侵害受害者是否（相較於非受害者）有較高的負面心理症狀，以及其影響程度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根據上述研究，本研究預期：性侵害受害者相較於非受害者，有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在性別差異方面，根據彭秀玲等人的結果，本研究假設女性受害者會有較明顯的心理症狀。

## （二）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行為

一直以來，性侵害被視為通報黑數極高的犯罪類型（Krebs et al., 2007; McCart et al., 2010; Sinozich & Langton, 2014），受害者可能因為各種內外在此的考量而不願意讓他人知道（或是只讓少數的人知道），或是不願意讓案件走進法律系統。過去研究將受害者的求助行為分為兩大類：「非正式揭露」（informal disclosure，向家人、朋友、配偶等尋求協助）以及「正式揭露」（formal disclosure，向醫院、警察、校方等機構尋求協助）。研究發現，雖然部分的受害者會向身邊的人揭露受害經驗，校園性侵害的正式通報比例卻十分的低（Krebs et al., 2007, 2016; Sinozich & Langton, 2014）。Krebs 等人（2016）的調查發現，有 64% 的性侵害受害者曾向家人或朋友揭露經驗，但僅有 13% 向警方求助以及 4% 向校方求助。王麗容等人（2012）的全國性調查中也發現，64 位性侵害受害者中僅有 12 位（20%）曾尋求正式或非正式協助，其中 6 位曾向家人求助、5 位曾向朋友／同事求助、2 位曾向宗教團體、2 位曾向警察單位、1 位曾向醫院、1 位曾向司法機構、1 位曾向學校單位求助。可見不管是在國內外性侵害受害者正式通報的比例都十分的低，造成很大的犯罪黑數。

不同層次的因素都可能影響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意願。Cohn 等人（2013）整理出三大類受害者不願意通報的理由：（1）「怕被其他人知道」（others knowing）：怕事件被家人或朋友知道、害怕他人的眼光與評價，因此確保受害者在通報程序中的保密性就十分重要；（2）「自認不夠嚴重或不是性侵」（non-acknowledgment）：不認為自己經驗夠嚴重或不算是性侵害，常常發生酒精或藥物影響的性侵害事件；（3）「對司法體系的知識或信心」（criminal justice concern）：對司法系統的程序與過程的不瞭解，以及對於通報是否對自己有利感到不安。同樣地，Ceelen 等人（2019）針對 287 位荷蘭未通報者的性暴力受害者之特質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加害者是熟人、喪失意識的性侵害（如利用對方酒醉時）、事件傷害較小的事件的通報率較低；在未通報的原因方面，許多人認為事情不會被相信或是認真對待（44%）、感到羞恥（42%）、沒有足夠的證據（37%）、認為警察不會或是無法有所作為（37%）、可能會破壞自己現有的生活（31%）。國內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王燦槐（2015）分析 195 位轉介到社福單位的少年性侵害受害者的資料，發現儘管性侵害是非告訴乃論，理論上進入社福單位通報率應該是 100%，但實務上社政人員仍可能會考量當事者的意願，通報率僅 82%。該研究發現當事人不願意通報的原因有以下幾種：證據力因素（30%）、社會支持因素（21%，尤其雙親離婚的受害者）、創傷因素（21%）、關係因素（16%，如受害者想原諒加害人）、不覺得受害（10%，尤其在男性身上特別明顯）。在校園性侵害方面，Spencer 等人（2017）發現除了個人層次的因子之外，體制性的因子（如，校園氛圍以及訓練課程）也是預測大專院校學生選擇向校方求助意願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不能將受害者不願意通報歸咎為受害者個人問題，而是應該考慮校園體制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本研究初步將上述影響受害者求助意願的因素，統整為以下幾點：（1）事件特性：即性侵害事件的性質，主要包含事件的嚴重性（Cohn et al., 2013）以及證據的有無（王燦槐，2015；Ceelen et al., 2019）；（2）加害者身分：即加害者身分的影響，特別是受害者與加害人之間的關係（王燦槐，2015）；（3）受害者感受：即受害者的主觀心理感受與想法，包含受害者的羞恥感（Ceelen et al., 2019）與心理創傷（王燦槐，2015）等因素；（4）求助管道的因素：即受害者對求助管道的想法與認知，包含對司法體系的知識與信心（Cohn et al., 2013）與求助體制的整體氛圍與態度（Spencer et al., 2017）；（5）害怕被別人知道：即受害者害怕或不希望事件曝光，與事件曝光可能產生的後果，例如破壞現有的生活（Ceelen et al., 2019; Cohn et al., 2013; Spencer et al., 2017）。

Dworkin 與 Schumacher（2018）回顧性侵害受害者創傷的文獻指出，受害者是否求助於正式或非正式管道求助，未必能有效避免性暴力的負面心理影響，關鍵在於這些個人或機構所提供的協助是否品質良好。他們進一步指出，並不能一味鼓勵受害者求助，而沒有檢視這些求助管道的品質，負面的求助經驗很可能會加深受害者的創傷相關症狀。有鑑於此議題的重要性，本研究將就兩個部分探討求助意願：首先，會詢問受害者過去的求助經驗（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的求助經驗。其次，會詢問大專院校學生未來若發生相關事件，願不願意向學校求助，以及（不）願意求助的原因。

### （三）性侵害與體制背叛理論（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

性侵害受害經驗個多層次且隨時間變化的歷程。不只是性侵害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體制和社會因素都影響受害者的傷害與復原的程度（Campbell et al., 2009）。舉例而言，性侵害受害者在通報或揭露受到性侵害的經驗後，常常沒有覺得得到幫助，如果遭遇到對方的冷漠或不當對待（如，問出責備受害者的問題、否定受害者經驗的言行），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負面心理影響，形同「二度傷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Campbell, 2008; Campbell & Raja, 1999）。Smith 與 Freyd（2013, 2014）提出「體制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的概念來理解各種「組織」或「體制」與性侵害受害者之間複雜的關係。他們主張，創傷事件對於受害者的二度傷害，部分來自於組織與個人間的特殊關係，也就是個人所身處的社會脈絡與權力關係。當一個組織對於個人十分重要，或是個人十分依賴、信任該組織時，當組織的不當作為或是不作為，對於個人而言很可能不只是再一次的「傷害」而已，而是破壞了受害者原先對於組織的信任感（Smith & Freyd, 2013）。舉例而言，當一個校園性暴力的受害者，因為信任學校的機制、老師或機構其他人員，而願意告訴他們自己的受害經驗，但揭露經驗之後卻沒有被重視、甚至被校方壓下來。在此情況下，受害者很可能會覺得整個學校（作為組織）背叛了他，原先對於世界的信任也隨之崩壞。也就是說，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可能因為原先所信賴或依賴的組織，對於自己受害事件的不當處置而感受到被體制所「背叛」，因而讓暴力傷害事件的傷害更加急遽（Smith & Freyd, 2013）。實徵研究也發現，經歷高體制背叛的性暴力受害有更嚴重解離與焦慮症狀（Smith & Freyd, 2013）、創傷相關症狀（Smith et al., 2016; Smith & Freyd, 2013; Wright et al., 2017）以及更容易有自殺意圖（Monteith et al., 2016）。

許多研究者以體制背叛觀點進行實徵研究，發現體制對於個人的傷害十分普遍且影響深遠。舉例而言，Smith 與 Freyd（2013）針對 345 名女性大學生進行問卷，發現 233 名（68%）曾經有過非自願的性經驗，而 46% 的受害者至少經歷過一種體制性背叛，最常見的幾項為：受害經驗被不被體制（通常指學校）當成一回事（22%）、體制使得這種經驗更容易發生（17%）、體制沒有積極性的作為（11%）、經驗難以通報到體制（9%）、體制將受害事件壓下來（9%）。Rosenthal 等人（2016）則針對 525 名研究生進行問卷，探討入學之後師生間性騷擾（包含學校職員對學生）、同學間性騷擾、性侵害、親密暴力、跟蹤騷擾（stalking）的受害經驗，發現體制性背叛與男性和女性的創傷症狀皆有正相關，也與女性知覺的校園安全有負相關。Smith 等人（2016）則是發現針對性少數性侵害受害者進行研究，體制背叛的程度同樣可以預測受害者的創傷症狀。根據上述研究，本研究預期：性侵害受害者的體制背叛感與負面心理症狀（憂鬱、焦慮與創傷症狀）有正向關聯，且與未來求助意願則有負向關聯。

過去研究指出，學校的支持有助於大學生面對與因應各種生涯逆境（吳淑偵，2018），但回顧國外文獻發現，性侵害受害者常因為所屬學校的不作為或是不當作為而產生負面的心理影響（Rosenthal et al., 2016; Smith & Freyd, 2013）。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事件，很可能因

為校方的種種作為而造成受害者對於體制感到背叛，進而造成憂鬱、焦慮以及創傷等負面心理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採取體制背叛觀點，試圖了解臺灣校園不當處置（或體制背叛感）的普遍性，及其對於受害者的負面心理症狀與求助行為的影響。

####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全臺灣大專院校學生進行網路問卷，探討臺灣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害受害經驗，及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本研究想了解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侵害的現況（發生比例與類型）與負面心理影響（憂鬱、焦慮與創傷症狀）。其次，本研究也會了解他們過去的求助經驗，以及影響未來求助意願的因素。再者，會針對臺灣校園體制不當處置（或體制背叛感）的現況，以及其對於性侵害受害者的影響進行探討。最後，將討論研究結果並提出若干實務上的建議。

### 方法

#### （一）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為年滿二十歲，目前或曾經（畢業兩年內）就讀全國大專院校的學生。初步回收網路問卷 644 份，扣除未滿二十歲或未提供就讀學校資訊者，共有 617 份有效樣本。本研究共涵蓋 114 間大專院校之學生（約涵蓋全國大專院校的 70%），其中有 367 名（59%）參與者就讀公立學校，250 名（41%）就讀私立學校。其中 340 名（55%）為男性，277 名（45%）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14 歲（ $SD = 2.73$ ）。在性傾向方面，有 500 名（81%）為異性戀，44 名（7%）為同性戀，68 名（11%）為雙性戀，5 名（1%）填寫其他答案。在社經地位方面，家庭總年收入之中位數為 80 萬至 90 萬元。在就讀身分方面，有 487 名（79%）為大學部學生或五專生，126 名（20%）為碩士班學生，4 名（1%）為博士班學生。完成問卷的參與者可參加抽獎獲得超商禮券。

#### （二）研究測量工具

##### 1. 性侵害受害經驗

本研究修改 Koss 等人（2006，2007）編製的「性經驗調查問卷－受害經驗短版」（Sexual Experiences Survey-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SES-SFV）以調查性侵害受害經驗，修改後題目共有 28 個小題。本問卷透過詢問不同的「行為」（例如，「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以及「手段」（例如，「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使用暴力」等）的組合，來捕捉不同類型的非自願性經驗。問卷內容並未提及「性侵害」或「猥褻」等詞彙，也能夠避免填答者主觀對於這些概念的認識（或不足）的影響。本研究針對原始問卷有以下修改：（1）首先，將原問卷插入陰道與肛門分開的小題合併，並將描述改為強迫其接合，以便同時處理不同性別可能遭遇的受害經驗；（2）其次，範圍限定發生在進入大專院校之後，並詢問經驗的對象是校內或是校外。完整問卷請參考附錄。

本研究針對「性侵害」的定義為：在受訪者不願的情況下，透過各種手段進行性器官（陰道、肛門、陰莖）的觸碰或結合（即〈刑法〉所定義之性交）。具體而言，在本問卷第 2 小題（「使我與別人進行口交或是被他人口交」）及第 3 小題（「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有任何一項經驗者，不論手段為強制或乘機性交，即稱為有「性侵害受害經驗」。

##### 2. 憂鬱及焦慮症狀

本研究採用 Kroenke 等人（2001）編製的「病人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請參與者自評過去兩週內的憂鬱症狀，該量表有 9 題，且在本研究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 .89$ ）。在效度方面，該問卷的中文版能夠有效篩檢門診病人的憂鬱症（ $AUC =$

.96)，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負相關 ( $r = -.49$ ) (Liu et al., 2011)。此外，本研究採用 Spitzer 等人 (2006) 編製的「廣泛型焦慮症檢測」(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Assessment, GAD-7)，請參與者自評過去兩周內的焦慮症狀，該量表有 7 題，且在本研究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91$ )。在效度方面，該問卷的中文版能夠有效篩檢門診病人的廣泛性焦慮症 (AUC = .88)，與焦慮症狀及住院次數皆有正相關 (Zeng et al., 2013)。此二量表皆為四點量尺，包含「從來沒有」(0 分)、「偶而有」(1 分)、「有時如此」(2 分)、「經常如此」(3 分)，分數越高代表症狀越嚴重。若加總分數為 0 到 4 分代表「無症狀」，5 到 9 分代表有「輕微症狀」，10 到 14 分代表有「中度症狀」，15 分以上代表有「中重度到重度」的症狀。為了避免參與者先回憶性侵害經驗、後填答症狀造成的影響，此二量表皆在性侵害受害經驗量表之前施測。

### 3. 創傷壓力症候群症狀

本研究採用王藝陵 (2010) 編製的「創傷後心理症狀指標量表－短版」測量在性侵害經驗後所經歷的創傷壓力症候群相關症狀，該量表有 16 題，且在本研究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95$ )。該量表為陳淑惠等人 (2000) 編製的「創傷後心理症狀指標量表」之簡短版，原量表有 47 題，參考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標準以及 921 大地震的資料所編製。本研究使用的短版量表與原始量表有相似的因素結構，且與憂鬱症狀 ( $r = .70$ ) 與生活滿意度 ( $r = -.34$ ) 皆有相關 (王藝陵, 2010)。該量表為四點量尺，包含「從來沒有」(0 分)、「偶而有」(1 分)、「有時如此」(2 分)、「經常如此」(3 分)，分數越高代表創傷的狀況越嚴重。如果在前部分沒有經歷過性侵害受害經驗，則不用填寫這個部分。

### 4. 過去求助經驗與未來求助意願

在過去求助經驗方面，本研究詢問參與者是否有因為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我曾經因為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是非題)，或是認識的人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認識的人曾經因為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向校方或師長求助。」，是非題)。在未來求助意願方面，本研究詢問參與者如果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會不會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選擇向學校或師長求助。」，七點量尺)，以及如果身邊的人發生這類事件會不會向校方或師長求助 (「如果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我會建議我身邊的人向學校或師長求助。」，七點量尺)。若在前部分有經歷過性侵害受害經驗，會詢問他們曾經向誰揭露此經驗。

本研究也詢問參與者認為阻礙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原因 (「你認為性侵害／性騷擾的受害者不願意向你的學校求助，可能的原因是什麼？」，開放式問題)，參與者的回應由一名編碼者進行完整分類與編碼，另一名編碼者則針對 20% 的回應進行編碼，在五個大類別皆有良好的評分者間信度 (Mean Cohen's  $\kappa = .84$ , Range = .73 – .93)，編碼上的不一致皆經過討論後解決。

### 5. 校園體制背叛感

本部分採用 Rosenthal 等人 (2016) 編製的「體制背叛與支持量表－初版」(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Sup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1, IBSQ.1) 中「體制背叛」部分題項測量校園非自願性經驗受害經驗後，經歷過所屬學校的體制背叛經驗。由於直接詢問「體制背叛感」的概念不容易理解，每個人可能有很大的差異，過去研究認為可以利用常見的體制背叛經驗來測量。因此儘管此變項稱為「體制背叛感」，但並非主觀對於體制的認知或評價，而接近過去經驗的檢核表 (Smith & Freyd, 2013; Rosenthal et al., 2016)。與性侵害受害經驗類似的是，問卷中並未提及「背叛」一詞，而是利用有無這些經驗來測量體制背叛的構念 (Smith et al., 2016; Smith & Freyd, 2013; Wright et al., 2017)。其中體制背叛的題目共有 12 題，描述可能體制中可能發生不當作為或不作為 (例如，「否認你的經驗」、「因為你通報事件而懲罰你」、「暗示你的經驗會影響學校的名聲」、「把事情壓下來」等)，且在本研究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94$ )。完整題項可參考表 4 的整理。本研究除了將該量表的「組織」或「體制」限定為學校，詢問性侵害事件過後該「學校」或「代表

學校的人」是否有題項所描述的作為，也將選項由是非題修改為四點量尺：「不符合」（0分）、「有點符合」（1分）、「大致符合」（2分）、「非常符合」（3分）。分數越高代表體制背叛的程度越高。如果在前部分沒有經歷過性侵害受害經驗，則不用填寫這個部分。

## 6. 人口變項及其他測量

除了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性傾向、社經地位等）以及就讀的大專院校，本研究利用兩個七點量尺題項測量校園安全感（「不論白天或晚上，獨自在學校裡活動是安全的」、「我認為學校是個容易發生犯罪事件的地方」，Cronbach's  $\alpha = .53$ ）。

###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經所屬大學之研究倫理中心審查通過後執行。為確保匿名性與更廣泛觸及大專院校學生，本研究以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者透過社群媒體平台（Facebook、批踢踢實業坊、Dcard）分享問卷連結，題名為「大專院校學生的非自願性經驗調查」，招募時說明此計畫探討大專院校學生非自願性經驗與對校園性別政策的看法，以及招募條件與抽獎內容。填寫完知情同意書之後，參與者自行在網路上填寫問卷。若填答者有意願參加超商禮券抽獎，可在問卷最後提供電子信箱或電話（非必填），以聯絡得獎事宜。以電子信箱或簡訊通知得獎後，會請得獎者提供稱呼方式（強調不需使用本名）以及寄送禮卷的地址，同時說明若中獎者希望其他寄送方式也可討論。在招募條件方面，招募文宣及知情同意書已重複說明必須年滿20歲，仍有部分在問卷中填答未滿20歲的年齡，為確保研究嚴謹性及研究倫理，此部分的資料皆不納入分析。資料的處理過程皆以匿名、去連結方式處理。問卷最後會提供各地區家防中心的連絡資訊，由於問卷皆匿名處理，研究者並不會主動進行通報。填寫完整份問卷大約需要20至30分鐘。資料收集時間為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24日。

## 結果

### （一）性侵害受害現況與類型

在617名有效參與者中，有34名（6%）自陳曾經有過性侵害受害經驗。在這些受害者中，有16名（47%）加害者在校內，4名（12%）加害者在校外，14名（41%）校內外加害者皆有。在受害者性別方面，有18名（53%）受害者為男性，有16名（47%）受害者為女性。在加害者性別方面，主要加害者為男性（19人，56%），較少為女性（7人，21%）或男女皆有（4人，12%），另有少數未填答此題（4人，12%）。此部分請參照表1的整理。

進一步分析個人變相對於受害比例的影響。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的受害比例並沒有差異（ $\chi^2(1, N = 617) = 0.94, p = .33$ ）。在年齡方面，年齡與性侵害受害與否之間並沒有關聯（ $r_{pb} = -.02, p = .62$ ）。在性傾向方面，非異性戀（9%）比異性戀（5%）更容易成為性侵害的受害者（ $\chi^2(1, N = 617) = 4.20, p = .04$ ）。

表 1  
性侵害受害比例與類型

|       |       | 人數 (%)    |
|-------|-------|-----------|
| 無受害經驗 |       | 583 (94%) |
| 有受害經驗 |       | 34 (6%)   |
| 受害者性別 | 男性    | 18 (53%)  |
|       | 女性    | 16 (47%)  |
| 加害者身分 | 校內    | 16 (47%)  |
|       | 校外    | 4 (12%)   |
|       | 校內外皆有 | 14 (41%)  |
| 加害者性別 | 男性    | 19 (56%)  |
|       | 女性    | 7 (21%)   |
|       | 男女皆有  | 4 (12%)   |
|       | 未填答   | 4 (12%)   |

## (二) 性侵害的心理影響

在心理影響方面，性侵害受害者的憂鬱症狀分數 ( $M = 10.68, SD = 6.25$ ) 顯著高於非受害者 ( $M = 5.50, SD = 5.23; t(35.75) = 4.74, p < .001$ )。若依照症狀嚴重度分類 (無症狀、輕度、中度、中重度以上) 進行次序邏輯式迴歸，性侵害受害經驗可以正向預測憂鬱症狀程度 (Wald's  $\chi^2(1) = 23.47, p < .001, OR = 5.14 [2.65, 9.97]$ )。同樣地，性侵害受害者的焦慮症狀分數 ( $M = 9.97, SD = 5.24$ ) 也顯著高於非受害者 ( $M = 5.55, SD = 4.67; t(615) = 5.33, p < .001$ )。若依照症狀嚴重度分類進行邏輯式迴歸，性侵害受害經驗可以正向預測焦慮症狀程度 (Wald's  $\chi^2(1) = 26.93, p < .001, OR = 5.37 [2.85, 10.12]$ )。此部分請參照表 2 的整理。性侵害受害者的校園安全感 ( $M = 7.56, SD = 2.82$ ) 也顯著低於沒有受害經驗的參與者 ( $M = 8.66, SD = 2.60; t(615) = -2.40, p = .02$ )。

表 2  
性侵害受害經驗與負面心理症狀嚴重度

|      | 嚴重度            |               |                 |                   |
|------|----------------|---------------|-----------------|-------------------|
|      | 無症狀<br>(0-4 分) | 輕度<br>(5-9 分) | 中度<br>(10-14 分) | 中重度以上<br>(15 分以上) |
| 憂鬱症狀 |                |               |                 |                   |
| 非受害者 | 317 (54%)      | 134 (23%)     | 93 (16%)        | 39 (7%)           |
| 受害者  | 8 (24%)        | 7 (21%)       | 7 (21%)         | 12 (35%)          |
| 焦慮症狀 |                |               |                 |                   |
| 非受害者 | 279 (48%)      | 198 (34%)     | 76 (13%)        | 30 (5%)           |
| 受害者  | 5 (15%)        | 10 (29%)      | 12 (35%)        | 7 (21%)           |

為了檢驗受害經驗所帶來心理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針對憂鬱、焦慮與校園安全感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性別的主效果只在校園安全感達顯著 ( $F(1, 613) = 6.70, p < .001$ )，顯示女性 ( $M = 8.05, SD = 2.53$ ) 比男性 ( $M = 9.28, SD = 2.57$ ) 更容易覺得在校園活動是不安全的。然而，性別的主效果在憂鬱與焦慮上並未顯著 ( $ps > .47$ )。受害經驗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在三個變項皆未顯著 ( $ps > .61$ )，顯示不論男女受害經驗皆有同等嚴重的心理症狀。

### (三) 性侵害受害者的求助行為

在過去求助經驗方面，本研究中有 14 名（2%）參與者曾經因為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向老師或校方求助，也有 83 名（14%）身邊的人曾經向老師或校方求助。在 30 名性侵害受害者（扣除 4 名未填寫此部分問卷者）中，共有 21 名（70%）曾經尋求非正式管道的協助，有 7 名（23%）曾尋求正式管道求助，有 6 名（20%）未曾向別人說過。在非正式管道方面，有 13 名曾向同學求助、7 名曾向校外朋友求助、5 名曾向家人求助以及 1 名曾向伴侶求助。在正式管道方面，有 4 名曾向學校師長尋求協助、2 名向心輔中心協助、1 名向家暴防治中心、1 名向醫療院所求助。

**表 3**  
大專院校學生認為影響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因素

| 大類別    | 小類別     | 人數 (%)    | 內容                           |
|--------|---------|-----------|------------------------------|
| 事件特性   | 案件性質    | 47 (7%)   | 嚴重程度、加害方式、熟人間的性侵             |
|        | 案件管轄    | 24 (4%)   | 發生地點、優先求助警察                  |
|        | 證據完整度   | 5 (1%)    | 證據/證人完整度                     |
|        | 總和      | 74 (12%)  |                              |
| 加害者身分  | 加害人身分   | 67 (11%)  | 加害者是本校學生、加害者是學校人員、加害者與學校特殊關係 |
|        | 加害人報復   | 15 (2%)   | 加害者威脅報復自己/家人                 |
|        | 保護加害者   | 1 (<1%)   | 保護加害者                        |
|        | 總和      | 83 (14%)  |                              |
| 受害者感受  | 情緒因素    | 25 (4%)   | 害怕、羞恥感/罪惡感、生氣                |
|        | 個人感受    | 28 (5%)   | 覺得是私人問題、不想鬧大、自尊問題、怕不被相信      |
|        | 社會支持    | 6 (1%)    | 有無社會支持                       |
|        | 總和      | 58 (9%)   |                              |
| 校園體制因素 | 學校氛圍    | 34 (6%)   | 學校性暴力氛圍、過去處理方式               |
|        | 通報體制特性  | 129 (21%) | 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              |
|        | 學校態度    | 104 (17%) | 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黑箱、壓下來 |
|        | 學校效能    | 80 (13%)  | 學校能力、學校態度、是否有效/預期後果          |
|        | 總和      | 307 (50%) |                              |
| 關係與面子  | 人際關係    | 35 (6%)   | 師生關係、家庭關係、同儕關係               |
|        | 他人眼光與面子 | 61 (10%)  | 擔心他人眼光、不想被人知道、面子             |
|        | 總和      | 91 (15%)  |                              |

註：N = 617。同一名參與者可能提到多個因素，因此加總會超過 100%。

在未來求助意願方面，若發生性暴力事件，女性 ( $M = 4.12, SD = 1.68$ ) 比男性 ( $M = 4.66, SD = 1.65$ ) 更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 $t(615) = 3.50, p < .001$ )。性侵害受害者 ( $M = 3.77, SD = 1.86$ ) 比起非受害者 ( $M = 4.44, SD = 1.67$ ) 更不願意向校方求助 ( $t(615) = -2.27, p = .02$ )。如果身邊的人發生性暴力事件，女性 ( $M = 4.76, SD = 1.59$ ) 比男性 ( $M = 5.02, SD = 1.55$ ) 更不願意建議身邊的人向學校求助 ( $t(615) = 2.07, p = .04$ )；性侵害受害者 ( $M = 4.27, SD = 1.75$ ) 相較於非受害者 ( $M = 4.91, SD = 1.56$ ) 也更不會建議別人向學校求助 ( $t(615) = -2.34, p = .02$ )。若針對未來求助意願進行受害經驗與性別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交互作用在自身求助經驗與建議他人求助皆未達顯著 ( $F_s < 0.49, ps > .48$ )。

在開放式問題方面，結果請參照表 3 的整理。本研究將參與者認為影響受害者向學校求助的因素分成以下五大類：（1）事件特性（74 人，12%）：包含事件性質、事件管轄以及證據的完整度；（2）加害者身分（83 人，14%）：包含加害人身分、加害人報復以及想保護加害人；（3）受害者

感受（58人，9%）：包含情緒因素、個人感受因素以及社會支持；（4）校園體制因素（307人，49%）：包含學校氛圍或過去處理方式、通報體制特性、學校態度以及學校效能；（5）關係與面子（91人，15%）：包含各種人際關係考量以及不想被他人知道的面子問題。

從表3可以發現，最多人重視的是「校園體制因素」，有半數的參與者提及此類別。也就是說，有半數的學生認為校園通報體制本身是影響受害者會不會求助的因素，其中有21%在意通報體制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通報體制特性」），17%會擔心通報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以及可能會被黑箱、被壓下來（「學校態度」），13%會擔心學校有沒有能力、有效率地處理事件以及是否這個機制是否效果（「學校效能」）。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人提到「案件性質」（7%）以及「加害人身分」（11%）的重要性。前者包含事件的嚴重程度、加害方式以及是否為熟人間的性侵，後者則是加害者是否是校內人士、學校人員或是與校方有特殊的關係。由此可見，案件的嚴重程度與類型，以及受害者、加害者與學校三方間的關係都可能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求助。最後，也有15%的人提到「關係與面子」的重要性，除了各種師生、家庭、人際關係的考量，許多人也害怕這件事情會曝光、擔心他人的眼光，這與前述國外的研究提到「害怕被別人知道」的結果相似（Cohn et al., 2013）。但特別的是，有14人（2%）直接提及「面子」這個詞彙，可見臺灣對於面子文化的重視可能讓受害者更不願意求助，因此本類別直接採用「關係與面子」來命名。

#### （四）體制背叛感及其影響

在校園體制背叛的題項中，性侵受害者最常感受到學校讓「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 $M = 1.07$ ,  $SD = 1.05$ ）或「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M = 0.83$ ,  $SD = 0.95$ ），詳細分數請參照表4的整理。此變項以0到3分計分，但題項的平均值大多落在1分以下，顯示體制背叛的程度並不高。從上一節的分析可以發現，多數受害者並未尋求正式管道協助，因此也可能反映了他們並未經歷學校體制的程序，或不認為學校體制與自身經驗有關。若進一步將「有點符合」以上的選項視為符合，則有20名（67%）受害者至少感受到一種體制背叛，其中有18名（60%）受害者曾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有16名（53%）感受到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15名（50%）感受到「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

表4  
性侵害受害者不同類型的體制背叛經驗（ $n = 30$ ）

|                                | 平均值（標準差）   | 提及比例 |
|--------------------------------|------------|------|
| （1）學校讓你難以通報你的經驗？               | 1.07（1.05） | 60%  |
| （2）學校事前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來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 0.83（0.95） | 53%  |
| （3）在你通報事件後，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回應？         | 0.77（0.94） | 47%  |
| （4）在你要求處分加害者後，並沒有適當處理你的案子？     | 0.77（0.90） | 47%  |
| （5）學校某些方面，否認你的經驗？              | 0.70（0.79） | 50%  |
| （6）使得整個環境，讓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學校一員？       | 0.70（0.88） | 47%  |
| （7）使得整個環境，讓你難以繼續待在學校裡面？        | 0.63（0.81） | 43%  |
| （8）學校把事情壓下來？                   | 0.63（0.81） | 47%  |
| （9）學校製造一個大家對這類事件習以為常的環境？       | 0.63（0.76） | 47%  |
| （10）學校因為你通報事件而懲罰你？（例如：喪失原有的權益） | 0.63（0.76） | 47%  |
| （11）學校製造一個使得這類事件更容易發生的環境？      | 0.60（0.77） | 43%  |
| （12）暗示你的經驗會影響學校的名聲？            | 0.50（0.78） | 37%  |
| 體制背叛感總分                        | 8.47（0.67） | 67%  |

註：「不符合」為0分、「有點符合」為1分、「大致符合」為2分、「非常符合」為3分。「提及比例」則是計算填答「有點符合」、「大致符合」或「非常符合」之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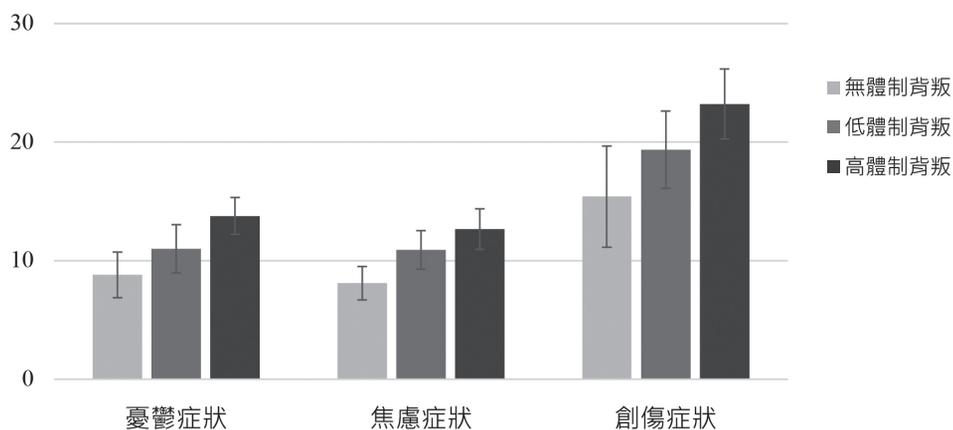
**表 5**  
性侵害受害者的體制背叛感與負面心理症狀之相關 ( $n = 30$ )

|            | (1)              | (2)  | (3)  | (4) |
|------------|------------------|------|------|-----|
| (1) 體制背叛感  | —                |      |      |     |
| (2) 憂鬱症狀   | .36 <sup>†</sup> | —    |      |     |
| (3) 焦慮症狀   | .33 <sup>†</sup> | .81* | —    |     |
| (4) 創傷症狀   | .30              | .72* | .68* | —   |
| (5) 未來求助意願 | .06              | -.12 | -.13 | .26 |

<sup>†</sup> $p < .10$ . \* $p < .05$ .

在體制背叛對受害者的影響方面，從表 5 的相關分析可以發現，體制背叛感與憂鬱症狀 ( $r = .36, p = .052$ ) 和焦慮症狀 ( $r = .33, p = .08$ ) 的正相關達邊緣顯著，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 ( $r = .30, p = .10$ ) 的相關雖未顯著，也有正向的趨勢，很可能與樣本數較小有關。也就是說體制背叛程度與負面心理症狀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並未支持本研究的假設。體制背叛感與未來向校方求助的意願 ( $r = .06, p = .76$ ) 則無關連。由於有 10 名受害者從未經歷過任一種體制背叛，其體制背叛分數為零，則將受害者命名為「無體制背叛」( $n = 10$ )，其餘參與者的體制背叛分數低於中位數者稱為「低體制背叛」( $n = 11$ )，高於中位數者為「高體制背叛」( $n = 9$ )，並以此分類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體制背叛程度與憂鬱症狀 ( $r_s = .31, p = .10$ )、焦慮症狀 ( $r_s = .33, p = .08$ )、創傷症狀之相關皆未顯著 ( $r_s = .28, p = .13$ )，但從圖 1 可以看出，體制背叛程度與這些指標有正向關聯的趨勢。體制背叛程度與未來向校方求助的意願 ( $r_s = -.03, p = .86$ ) 並無關連。

**圖 1**  
性侵害受害者之體制背叛程度與負面心理症狀



註：誤差線表示標準誤差 (standard error)。

## 討論

### (一) 結果討論

在本研究中，臺灣大專院校學生的性侵害比例約為 6%，大部分加害者為校內對象，可見性侵害在大專院校學生間仍是十分嚴重的議題。本研究中性侵害受害比例略高於王麗容等人（2012）針對全年齡層的調查，也呼應了國外研究指出大學生的受害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Fedina et al., 2018）。然而，過去研究指出，隨著取樣方式或題項描述的差異，盛行率的估計會有很大的差異（Fedina et al., 2018），由於本研究並非隨機抽樣而是利用網路平台觸及參與者，因此在詮釋此「盛行率」時必須有所保留。本研究發現主要的加害者為男性，但男性與女性都同樣容易成為性侵害的受害者，與過去研究並不符合。儘管過去研究較多關注女性受害人，男性受害人的處境也更該受到更多關注（陳建泓，2015；黃軍義，2015）。本研究也發現性少數身分可能導致學生暴露在性侵害的風險中，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導致他們更容易成為受害者，在進行預防與處遇時也應該考慮不同族群的需求。

國外研究指出，發生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的性暴力事件可能讓受害者有較多的憂鬱、焦慮、創傷症狀，也與睡眠以及性方面的困擾有關（Smith & Freyd, 2013），也會造成受害者校園安全感的喪失（Rosenthal et al., 2016）。過去並沒有國內研究針對校園性侵害的負面影響進行全國性的調查，本研究發現性侵害受害者有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也有一定程度的創傷症狀，與過去研究相呼應。與過去研究（彭秀玲等人，2015）不同的是，本研究並沒有發現心理影響的性別差異，可見性侵害的影響是不分性別、經過長時間依然持續的。需注意的是，由於本研究中受害者人數較少（34名），因此在詮釋性別分析結果時應有所保留。不論國內外性侵害對於受害者都會產生長期且重大的影響，且威脅高等教育的學生健康與發展，校方應該特別重視性侵害議題的嚴重性。在本研究中，性侵害也與校園安全感的喪失有關，此亦呼應過去的研究結果（Rosenthal et al., 2016）。提升校園空間的安全、減少治安死角，或許可以幫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活中的控制感，減少一部分的負面心理影響。其中女性普遍認為校園較不安全，也意味著大學校園可能並未有效地確保女性的人身安全。

在本研究中，同學跟朋友仍然是主要的求助管道，30名受害者僅有7人向正式管道求助。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似，不論國內外性侵害受害者都是優先向親友求助，較少會正式求助（王麗容等人，2012；Krebs et al., 2007）。因此，受害者第一次揭露經驗的對象的反應就非常重要，如何避免責備受害者的言論以及造成二度傷害，不只是學校第一線的人員，而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注意的功課。然而如同 Dworkin 與 Schumacher（2018）所言，受害者求助後不一定有正向的結果，也因此許多人寧可抱持沉默。由於負面的求助經驗可能會加深受害者的創傷症狀，因此在與其一味鼓勵受害者求助，必須先檢視求助管道的品質與是否符合受害者的需求。

女性、性侵害受害者較不願向校方求助，而校園體制特性是影響求助意願的重要因素。社會對於性侵害受害者的汙名可能是造成女性不願意求助的原因，而有過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受害者可能因為過去不好的求助經驗（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而降低他們對於求助管道效能的認知。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性侵害受害者嚴重的心理後果（如憂鬱或創傷反應），可能讓他們更沒有求助的意願。我們也發現，女性、性侵害受害者不只自己不願意求助，也較不願意建議身旁的人求助。若從「旁觀者介入」觀點出發，旁觀者的消極可能會形成更不安全的校園文化，如何提升校園內性暴力事件的互助與敏感度，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李佩珊、謝百淇，2020；李佩珊等人，2018）。更重要的是，要培力女性以及過去曾有受害經驗的受害者，就必須提升他們遇到性暴力時求助的意願，而這又關乎如何提升他們對於現有校園通報體制的效能感與信心。本研究發現，大專院校學生認為「事件特性」、「加害者身分」、「受害者感受」、「校園體制因素」、「關係與面子」是影響受害者願不願意五大因素，除了臺灣大學生對於校園體制因素以及「面子文化」的重視，分類與過去文獻大致呼應（Ceelen et al., 2019；Cohn et al., 2013；Spencer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有將近一半（49%）學生的認為校園通報體制本身是影響受害者會不會求助的因素，其中許多人在意通報體制是否能提供具有易達性、保密性、信任感、公平性的通報機制，可見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脈絡下，目前的性平體制對於使用者仍然不夠友善（廖珮如，2017；羅燦煥，2014）。本研究發現，有 17% 的學生會擔心通報學校願不願意積極處理、第一線人員師長態度或事件可能會被壓下來，13% 則會擔

心學校有沒有能力處理性平事件。也就是說，除了對於體制本身的陌生與不信任，特定學校過去的處理方式與校園氛圍也可能影響大專院校學生的求助意願。尤其在臺灣，當校方處置不當的案例登上新聞版面，除了會加深未通報受害者的傷痛、也很可能會讓其他人未來若發生類似的事件時選擇不通報，形成不願意通報的文化。

在本研究中儘管體制背叛程度並不高，但仍有部分題項有過半數的人有類似經驗，校園的體制背叛依然存在。最常見的類型為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或是校方「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也有許多人感到「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除了針對性平案件處理過程進行改善，調查人員也應該注意學生的感受，並適時與諮商輔導專業互相合作，加強跨專業合作技能（張淑芬，2015）。如前所述，影響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的原因，除了對於體制陌生包含對於體制的的不信任；若校內發生（疑似）性平事件，受害者很可能感受到校方並沒有及時阻止事情發生。若在考慮要不要通報的過程中，第一線人員沒有足夠的敏感度，或是學校宣導或網站上的資訊不清晰，都可能讓受害者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甚至是經驗遭到否認。從體制背叛理論的觀點，這些都可能對受害者產生長期的影響。然而，儘管國外文獻發現體制背叛感可能產生負面的心理影響（Smith et al., 2016; Smith & Freyd, 2013; Wright et al., 2017），本研究部分並未支持此假設，校園的體制背叛感與憂鬱、焦慮與創傷症狀之間有正相關的趨勢，但均未達顯著，很可能與本研究有性侵受害經驗人數較少有關係。總結而言，本研究關注國內學校體制不當作為對受害者的影響，發現校園體制的不當作為依然存在，儘管不一定會直接產生嚴重的心理後果，實務工作者仍應該注意避免這些負面感受。

##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 1. 網路資料的限制與倫理

本研究利用網路平台隨機發放問卷，使用網路問卷有其優點。其中最主要的好處當是能夠觸及更多的參與者，且在匿名填寫的狀況下，希望能夠邀請更多不希望揭露身分或面對面的受害者參與。過去研究指出，許多受害者並不認為或不確定自己的經驗是「性侵害」（unacknowledged rape）（Littleton et al., 2007），利用網路平台的問卷發放問卷，由於在招募與問卷題項皆未提及「性侵害」，而是利用行為來進行測量，能夠觸及這些不會主動參與研究的參與者。儘管如此，本研究的受害者人數仍有限，依然難以進行更細緻的分析（例如，使用不同求助管道的受害者，心理症狀與體制背叛感有無差異），未來研究可考慮進行更大型的全國性調查，或是以質性資料輔助呈現，將有助於研究的豐富度。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可能產生以下幾點限制以及倫理議題。首先，本研究利用網路平台發放問卷，並非隨機抽樣，可能造成抽樣上的誤差，未來研究應使用更為隨機的抽樣方式（如，照學校或地區分層抽樣）以了解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的現況。其次，也必須要注意受害者在填答過程中，會不會因為填答過程中產生負面的心理反應，除了必須注意題目的設計，若能夠提供心理輔導的資源或聯絡方式，將有助於避免對於受害者的傷害。最後，本研究使用網路問卷的目的是希望在確保匿名的狀況下，了解性侵害受害者的經驗。基於研究的需求，問卷蒐集了個人背景變項與就讀學校資訊。由於受害者人數較少不易分析，且為了避免身分被辨認出來，在分析時僅初步分析性別、性傾向、年齡的影響，並未針對學校資訊進行分析。未來研究在蒐集與報告個人變項時，應考量受害者是否會擔心個人身分曝光，以及蒐集這些資料是否真有必要。

### 2. 捕捉性暴力的多重面貌

性暴力的樣貌十分多元，每個人的受害經驗都不盡相同，利用量化調查無法兼顧所有可能變項，因此在詮釋時必須注意其中的差異性。首先，儘管在緒論中提及「校園性侵害」以及「校園體制背叛」的用語，問卷中並未詢問受害的地點，因此不一定是發生在「校園」內。由於樣本數量的限制，也無法針對「校內」與「校外」加害者的影響進行分析，如果加害者本身就是校方人員可能會對於受害者產生更嚴重的傷害，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也可能使得受害者面臨正義無法伸張，或是擔心生涯發展受阻的處境（彭秀玲、黃曬莉，2017）。未來研究應針對體制內雙方可能存在的權力關係進

行探討。

其次，本研究亦無法排除「約會暴力」的可能性。由於本研究並未針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進行區分，很可能填答者在作答時，是針對親密伴侶的性暴力作答（沈瓊桃，2013；修慧蘭、孫頌賢，2003）。沈瓊桃（2013）針對全國 601 名大專院校學生的調查發現，約有 7.6% 在過去一年內曾遭受伴侶的性暴力，有一定程度的普及率；在因應行為方面，約會暴力與受暴婦女的因應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發生在（前）伴侶關係中的性侵害與非伴侶的性侵害，在心理影響與求助行為上很可能有所差異，未來研究應針對此部分進行區分。過去研究也發現，面對發生大學生身上的親密暴力，很多時候也是校園心輔體制需要面對議題，需要有適切的處遇與風險評估（王沂釗、陳若璋，2011），這也很可能會導致體制背叛的問題。

### 3. 體制背叛理論及其不滿

根據體制背叛理論，性侵害受害者對於校園體制的信任，可能因為校方（第一線的師長、心輔中心、性平會等）的不作為或不當作為，而產生體制背叛感，進而加強性侵害創傷（Smith & Freyd, 2013）。本研究並沒有完全支持這個假設。這並不意味著校方的處理方式不重要，從表 3 就可以看出，影響受害者求助的心理歷程是非常複雜的。尤其本研究並未直接測量學生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的理解與期待，很可能他們對於體制的不信任是源自於他們的不了解，又或許是他們對於性平體制有不符合現實的期待。由於受害者求助的過程中可能面對種種問題，若能在處理之前明確告知可能產生的傷害與可能的結果，或許有助於增加受害者的體制效能感，協助受害者的身心復原。未來研究可更細緻地探討大專院校學生對於校園性平體制的知識、期待與態度，以及如何能夠進一步改善他們對於體制的感受。

由於不同學校性暴力的狀況以及性暴力議題的狀況都不一樣，單靠一個研究無法深入針對每個學校進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在改善校園性平政策時應該先了解校內的現況、進行「校園氛圍調查」，了解學生性暴力的現況以及對於校園體制的認知，找出校園既存的問題（McCaskill, 2014; White House, 2014）。唯有了解現況，才能夠對症下藥。有數據做為支持，在政策的推動上也更能夠得到多方的支持。校園氛圍調查本身也是展示校方對於性暴力議題重視的方式，可以藉此增加大專院校學生對於校方的理解與信心。期待未來研究能考量個別校園的狀況，同時兼顧校園體制的特殊性以及與不同系統間的互動關係。此將有助於臺灣校園性平體制的完善，防止再有性暴力受害者成為不良體制下的犧牲者。

## 參考文獻

- 王沂釗、陳若璋（2011）：〈大學生親密關係暴力：其性質與實務工作者處遇能力之分析〉。  
《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0，1-29。[Wang, Y.-C., & Chen, R.-C. (2011).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capacities of therapists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0, 1-29.] <https://doi.org/10.6472/JFEC.201106.0001>
- 王燦槐（2015）：〈我國少年性侵害被害人報案因素之研究〉。《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11，113-136。[Wang, C.-H. (2015). The research of report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 sexual assault victim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se*, 11, 113-136.]
- 王麗容、陳芬苓、王雲東（計畫主持人）（2012）：《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之研究期末報告》（計畫編號：PG10007-0094）。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內政部。<https://dep.mohw.gov.tw/dops/cp-1147-7958-105.html> [Wang, L.-R., Chen, F.-L., & Wang, Y.-T. (Principal Investigator). (2012). *A survey of sexual violence in Taiwan* (Final Report) (Report No.

- PG10007-0094) (Grant).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147-7958-105.html>]
- 王藝陵 (2010) : 《乳癌婦女的創傷後成長對其安適感之影響：手術距今時間、診斷期數及人格特質可能的調節角色》(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Wang, Y.-L. (2010). *The effect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on well-be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time since surgery, stage of disease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李佩珊、陳香廷、洪瑞兒 (2018) : 〈發展「性騷擾防治旁觀者介入課程」及實施成效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3 (3) ，1-35。[Lee, P.-S., Chen, H.-T., & Hong, Z.-R. (2018). Effects of a bystander intervention curriculum for preventing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3(3), 1-35.] [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809\\_63\(3\).0001](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809_63(3).0001)
- 李佩珊、謝百淇 (2020) : 〈為弱勢者發聲：高中生之偏見察覺力與旁觀者介入知能課程探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8 (1) ，39-73。[Lee, P.-S., & Shien, P. P. (2020). Speaking up for the disadvantaged: Empower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ejudice awarenes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 behavi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8(1), 39-73.]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
- 吳淑偵 (2018) : 〈生涯韌力：大學青年的生涯逆境知覺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3 (3) ，197-230。[Wu, S.-C. (2018). Career resilience: Career adversities and the effects of coping strategies 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career pat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3(3), 197-230.] [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809\\_63\(3\).0007](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809_63(3).0007)
- 沈瓊桃 (2013) : 〈大專青年的約會暴力經驗與因應策略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 ，1-13。[Shen, C.-T. (2013). Dating viol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6, 1-13.]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303\\_26\(1\).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303_26(1).0001)
- 周雅淳 (2002) : 《不止是受害者—性暴力創傷經驗與自我重建》(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Chou, Y.-C. (2002). *Beyond victimization: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self reconstruction after sexual violen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施安吟 (2002) : 《台灣地區女性性侵害受害者創傷之相關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Shih, A.-L. (2002). *The trauma of the Taiwan sexual assault victim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修慧蘭、孫頌賢 (2003) : 〈大學生約會暴力行為之測量與調查〉。《教育與心理研究》，26 (3) ，471-499。[Hsiu, H.-L., & Sun, S.-H. (2003). The measurement and investigation of dating viol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6(3), 471-499.]
- 張淑芬 (2015) : 〈心理師從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類社區諮商之跨專業系統合作能力初探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7 (1) ，23-43。[Chang, S.-F. (2015). The core competence for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counseling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s collaboration: An exploration study on community counseling.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7(1), 23-43.] <https://doi.org/10.6251/BEP.20140904>

- 陳建泓 (2015) : 〈沒有受害位置的受害人—男性性侵害受害人之困境與復原〉。《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7 (1) , 1–11。 [Chen, J.-H. (2015). How could it happen- male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therapy.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7(1), 1–11.]
-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 (2000) : 〈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意涵〉。《社會文化學報》, 10 , 35–60。 [Chen, S.-H., Lin, Y.-S., Hung, F.-C., & Tseng, H.-M. (2000). Posttraumatic psychosocial reaction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Psycho-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hanged and unchanged. *Journal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0, 35–60.]
- 陳惠馨 (2005) : 〈認真對待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與展望〉。《國家政策季刊》, 4 (1) , 21–32。 [Chen, H.-S. (2005). A serious attitude toward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Law. *National Policy Quarterly*, 4(1), 21–32.] <https://doi.org/10.6407/NPQ.200503.0021>
- 陳慧女 (2016) : 〈校園性別平等事件調查報告做為性侵害案件證據之探討〉。《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12 (1) , 81–106。 [Chen, H.-N. (2016). The explorat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gender equality event as testimony of the sexual abuse case.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se*, 12(1), 81–106. ]
- 陳慧女、盧鴻文 (2013) : 〈性侵害被害人自我療癒與對修復式正義的看法〉。《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9 (1) , 29–48。 [Chen, H.-N., & Lu, H.-W. (2013). Self-recovery of sexual abuse victims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 restorative justice.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se*, 9(1), 29–48.]
- 彭秀玲、黃曬莉 (2017) : 〈師生戀變奏曲？—女大學生師生性騷擾之經驗歷程〉。《教育心理學報》, 48 (3) , 427–448。 [Peng, S.-L., & Huang, L.-L. (2017). A variation of professor-student affairs?- The sexual harassment experience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3), 427–448.]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427>
- 彭秀玲、黃曬莉、李仁豪 (2015) : 〈性騷擾經驗與憂鬱之關係—創傷反應作為中介因子及性別為調節變項〉。《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44 , 105–132。 [Peng, S.-L., Huang, L.-L., & Li, R.-H.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 harassment experiences and depression: Traumatic reaction as mediator with gender as moderator.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4, 105–132.]
- 黃軍義 (2015) : 〈男性性侵害循環的發生機制〉。《教育心理學報》, 46 (4) , 471–489。 [Huang, J.-Y. (2015).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al mechanisms behind the male sexual victim-perpetrator cycl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6(4), 471–489.] <https://doi.org/10.6251/BEP.20140709>
- 焦興鎧 (2007) : 〈我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構—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條文之剖析〉。《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62 , 41–90。 [Chiao, C.-K. (2007).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on campus mechanism in Taiwan-An analysis of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Act of 2004. *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62, 41–90.] <https://doi.org/10.6774/TULR.200706.0041>
- 楊思芳、丁原郁 (2017) : 〈兒少性虐待受害者與身體虐待受害者在心裡創傷與生理健康之比較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49 (2) , 321–343。 [Yang, S.-F., & Ting, Y.-Y. (2017). A

-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d physical abuse in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physical healt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2), 321–343.]  
[https://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7](https://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7)
- 廖珮如 (2017) : 〈性平機制與行政體系的拉鋸：大專院校性平業務承辦人的建制日常〉。《台灣社會學》，34，45–89。[Liao, P.-R. (2017). Objectification of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in higher education: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Taiwan Sociology*, 34, 45–89.]  
[https://doi.org/10.6676/TS.201712\\_34.0003](https://doi.org/10.6676/TS.201712_34.0003)
- 羅燦煥 (2014) :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之近憂與遠慮〉。《婦研縱橫》，101，45–53。[Luo, T.-Y. (2014). The near-worry and far-sightedness of campus gender incident investigation.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01, 45–53.]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4.101.45>
- 蘇素美 (2017) : 〈社交自我效能與害怕負面評價在害羞對憂鬱之影響的中介效果〉。《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2 (1)，103–132。[Su, S.-M. (2017). Mediation effects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shyness on depres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2(1), 103–132.] [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7.62\(1\).04](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7.62(1).04)
- Ahrens, C. E. (2006). Being silenced: 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reactions on the disclosure of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8, 263–274. <https://doi.org/10.1007/s10464-006-9069-9>
- Black, M. C., Basile, K. C., Breiding, M. J., Smith, S. G., Walters, M. L., Merrick, M. T., & Stevens, M. R. (2011).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 2010 summary report*.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NISVS\\_Report2010-a.pdf](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NISVS_Report2010-a.pdf)
- Campbell, R. (2008).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ape victi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8), 702–717.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3.8.702>
- Campbell, R., Dworkin, E., & Cabral, G. (2009). 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xual assault on women's mental health.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0(3), 225–246.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09334456>
- Campbell, R., & Raja, S. (1999).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of rape victims: Insights from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treat survivors of violence. *Violence and Victims*, 14(3), 261–275.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4.3.261>
- Ceelen, M., Dorn, T., van Huis, F. S., & Reijnders, U. J. (2019). Characteristics and post-decision attitudes of non-reporting sexual violence victim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9), 1961–1977.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6658756>
- Cohn, A. M., Zinzow, H. M., Resnick, H. S., & Kilpatrick, D. G. (2013). Correlates of reasons for not reporting rape to polic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telephone household probability sample of women with forcible or drug-or-alcohol facilitated/incapacitated rap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8(3), 455–473.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2455515>
- Conley, A. H., Overstreet, C. M., Hawn, S. E., Kendler, K. S., Dick, D. M., & Amstadter, A. B. (2017).

-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sexual assault among a college sample.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5(1), 41–49. <https://doi.org/10.1080/07448481.2016.1235578>
- Dworkin, E. R., & Schumacher, J. A. (2018). Pre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related to sexual assault through early interven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4), 459–472.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6669518>
- Fedina, L., Holmes, J. L., & Backes, B. L. (2018). Campus sexual assaul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valence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15.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1), 76–93.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6631129>
- Ford, J., & Soto-Marquez, J. G. (2016).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straight, gay/lesbian, and bisexual college students. *Violence and Gender*, 3(2), 107–115. <https://doi.org/10.1089/vio.2015.0030>
- Hines, D. A., Armstrong, J. L., Reed, K. P., & Cameron, A. Y. (2012).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Violence and Victims*, 27(6), 922–940.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27.6.922>
- Koss, M. P., Abbey, A., Campbell, R., Cook, S., Norris, J., Testa, M., Ullman, S., West, C., & White, J. (2006). *The sexual experiences 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SES-SFV)*. University of Arizona. <https://www.midss.org/content/sexual-experiences-survey-short-form-victimization-ses-sfv>
- Koss, M. P., Abbey, A., Campbell, R., Cook, S., Norris, J., Testa, C., Ullman, S., West, C., & White, J. (2007). Revising the SE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to improve assessment of sexual aggression and victimizati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 357–370.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2007.00385.x>
- Krebs, C., Lindquist, C., Berzofsky, M., Shook-Sa, B., Peterson, K., Planty, M., Langton, L., & Stroop, J. (2016). *Campus climate survey validation study: Final technical report*.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ccsvsfr.pdf>
- Krebs, C. P., Lindquist, C. H., Warner, T. D., Fisher, B. S., & Martin, S. L. (2007). *The campus sexual assault (CSA) study: Final report*.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nij/grants/221153.pdf>
- Kroenke, K., Spitzer, R. L., & Williams, J. B. (2001). The PHQ-9: Validity of a brief depression severity measure.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6(9), 606–613. <https://doi.org/10.1046/j.1525-1497.2001.016009606.x>
- Littleton, H. L., Rhatigan, D. L., & Axsom, D. (2007). Unacknowledged rape: 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the hidden rape victim?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14(4), 57–74. [https://doi.org/10.1300/J146v14n04\\_04](https://doi.org/10.1300/J146v14n04_04)
- Liu, S.-I., Yeh, Z.-T., Huang, H.-C., Sun, F.-J., Tjung, J.-J., Hwang, L.-C., Shih, Y.-H., & Yeh, A. W.-C. (2011). Validation of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for depression screening among primary care patients in Taiwan.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52(1), 96–101. <https://doi.org/10.1016/j.comppsy.2010.04.013>

- McCart, M. R., Smith, D. W., & Sawyer, G. K. (2010). Help seeking among victims of crim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23(2), 198–206. <https://doi.org/10.1002/jts.20509>
- McCaskill, C. (2014). *Sexual violence on campus: How too man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failing to protect students*.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https://www.mccaskill.senate.gov/SurveyReportwithAppendix.pdf>
- Mellins, C. A., Walsh, K., Sarvet, A. L., Wall, M., Gilbert, L., Santelli, J. S., Thompson, M., Wilson, P. A., Khan, S., Benson, S., Bah, K., Kaufman, K. A., Reardon, L., & Hirsch, J. S. (2017). Sexual assault incidents among college undergraduates: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isk. *PLOS ONE*, 12, Article e018647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86471>
- Monteith, L. L., Bahraini, N. H., Matarazzo, B. B., Soberay, K. A., & Smith, C. P. (2016). Per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predict suicidal self-directed violence among veterans exposed to military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2(7), 743–755. <https://doi.org/10.1002/jclp.22292>
- Peter-Hagene, L. C., & Ullman, S. E. (2015). Sexual assault-characteristics effects on PTSD and psychosocial mediators: A cluster-analysis approach to sexual assault type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7(2), 162–170. <https://doi.org/10.1037/a0037304>
- Rosenthal, M. N., Smith, A. M., & Freyd, J. J. (2016). Still second class: Sexual harass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0(3), 364–377. <https://doi.org/10.1177/0361684316644838>
- Sinozich, S., & Langton, L. (2014).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college-age females, 1995-201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rsavcatf9513.pdf>
- Smith, C. P., Cunningham, S. A., & Freyd, J. J. (2016). Sexual violenc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for LGB college students.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351–360. <https://doi.org/10.1037/tps0000094>
-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3). Dangerous safe haven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es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1), 119–124. <https://doi.org/10.1002/jts.21778>
-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4).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9(6), 575–587. <https://doi.org/10.1037/a0037564>
- Spencer, C., Stith, S., Durtschi, J., & Toews, M. (2017). Factors related to college students' decisions to report sexual assaul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21–22), 4666–4685.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7717490>
- Spitzer, R. L., Kroenke, K., Williams, J. B., & Löwe, B. (2006). A brief measure for assess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The GAD-7.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6(10), 1092–1097. <https://doi.org/10.1001/archinte.166.10.1092>
- Wang, C.-H., Lee, J.-C., & Yuan, Y.-H. (2014). Assess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Sexual Assault Symptom Scale (C-SASS):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9(1), 128–143.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3504649>

- White House Task Force to Protect Students from Sexual Assault. (2014). *Not alone: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to protect students from sexual assault*.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report\\_0.pdf](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report_0.pdf)
- Wright, N. M.,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7).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Study abroad, trauma, and institutional betrayal.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6(1), 50–68.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6.1170088>
- Zeng, Q.-Z., He, Y.-L., Liu, H., Miao, J.-M., Chen, J.-X., Xu, H.-N., & Wang, J.-Y. (201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GAD-7) scale in screening anxiety disorders in outpat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rnal department.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7(3), 163–16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29.2013.03.001>

收稿日期：2020年04月19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0年04月25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0年07月26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0年08月12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0年08月19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0年08月31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09月01日

**附錄 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問卷****【問卷說明】**

此部分是關於您進入目前就讀的（或剛畢業的）大專院校之後，可能遭遇過非自願的性經驗，請勾選您曾經有過的經驗。您的所有回答都會保密，且不會留下任何個人資料，請放心填答。我們會詢問非自願經驗的手段，如果同一次經驗有多個手段（如：利用 (a) 說謊以及 (c) 趁你喝醉時），請兩個地方都勾選。

再次提醒，您的所有資料都會保密處理，請放心填答。

進入目前的學校就讀之後，校內的人（學生、老師、工友等）……

1.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撫弄、親吻、觸摸我的私密部位（胸部、胯下或臀部）或脫掉我身上一部分的衣服（但沒有試圖進行性器官插入）：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2.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讓我進行口交或是被他人口交：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3. 曾經「利用以下的手段」，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4. 曾經「試圖」利用以下的手段，使我與別人進行口交或是被他人口交（但沒有成功）：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5. 曾經「試圖」利用以下的手段，用性器官、手指或其他物體插入我的陰道或肛門，或是逼迫我插入他／她的陰道或肛門（但沒有成功）：
- (a) 在我說不要之後，利用說謊、威脅要分手、威脅要散播謠言、對我許下不可能承諾、或持續用言語逼迫我
  - (b) 在我說不要之後，表現出不悅、批評我的身材或性吸引力、或突然發怒（但並未使用暴力）
  - (c) 利用我喝醉或是意識無法反抗的情況
  - (d) 威脅要用暴力傷害我或是我身邊的人
  - (e) 使用暴力。例如，用身體重量推倒我、壓住我的手臂、或使用武器等。
6. 請問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後，有「校外的人」（親戚、陌生人、校外朋友）對你做過 1~5 題所描述的經驗嗎？
- 有過第 1 題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2~3 題中 (a) 或 (b)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2~3 題中 (c)、(d) 或 (e)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4~5 題中 (a) 或 (b)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4~5 題中 (c)、(d) 或 (e)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沒有上述經驗
7. 請問上述非自願經驗對象的性別是（包含校內與校外）……？
- 男生
  - 女生
  - 男生與女生都有
  - 沒有上述經驗
8. 請問在進入目前的學校「之前」，有任何人對你做過 1~5 題所描述的經驗嗎？
- 有過第 1 題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2~3 題中 (a) 或 (b)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2~3 題中 (c)、(d) 或 (e)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4~5 題中 (a) 或 (b) 選項描述的經驗
  - 有過第 4~5 題中 (c)、(d) 或 (e) 選項描述的經驗

###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其他：\_\_\_\_\_
2. 性傾向：  
 我喜歡異性  我喜歡同姓  我喜歡同性，也喜歡異性  其他：\_\_\_\_\_
3. 出生年份：\_\_\_\_\_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1, 53(1), 61–8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Among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mpact,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al Betrayal

Lih-Rong W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uan-Ju Hu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xual assault on campus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media and academic attention. Sexual assault has substantial long-term impacts on mental health, including depression, anxiety, posttraumatic stress, substance abuse, sleep disturbance, and suicide (Black et al., 2011; Campbell et al., 2009; Smith & Freyd, 2013; Wang et al., 2014). Despite its psychological outcomes, relatively few survivors seek help from formal support networks (e.g., hospitals,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centers,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s, and police), although many seek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Krebs et al., 2007, 2016; Sinozich & Langton, 2014; Wang et al., 2012). Furthermore, in response to coverage of the mistreatment of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research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begun to examine how universities respond to sexual assault and its consequences (McCaskill, 2014). Institutional failures to respond to sexual assault cases (e.g., insensitive investigative practices) can result in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which may have serious impacts on a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Campbell et al., 2009). In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 posits that wrongdoings perpetrated by university agencies (e.g., denying the survivor's experiences or punishing them in some way) can cause feeling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ing the sexual trauma experienced by survivors (Smith & Freyd, 2013, 2014). Approximately 2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which stipulates how schools at different levels should respond to sexual violence cases on campus. However, no study in Taiwan has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and university reactions to sexual assaul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present study thus investigated (1)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2) help-seeking behaviors with regard to sexual assaul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more crucially, (3) the preval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instance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In all, 617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45% female students, 81% were heterosexual, mean age = 23.14 years) completed an online survey including measures of sexual assault experiences (Sexual Experiences Survey-Short Form Victimization; Koss et al., 2006), depression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Cronbach's  $\alpha = .89$ ; Kroenke et al., 2001), anxiety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Assessment, Cronbach's  $\alpha = .91$ ; Spitzer et al., 2006),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Index-Short Form, Cronbach's  $\alpha = .95$ ; Wang, 2010), their willingness to report future assault to the campus reporting system (i.e., "Would you report future sexual victimization to your university or teachers?"), and demographics (e.g., age,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They also responded to an open-ended question regarding factors that might encourage/discourage the reporting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to their university. The responses were categorized by two independent coders with high interrater reliability (mean Cohen's  $\kappa = .84$ , range = .73–.93). Additional questions were administered if respondents reported being victimized, including their help-seeking behaviors after the assault (i.e., "Whom did you seek help from after the assault?") as well as experience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by their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Sup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1, Cronbach's  $\alpha = .94$ ; Rosenthal et al., 2016).

In the survey, 34 (6%) respondents reported one or more experiences of sexual assault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and most of the cases were on campus and conducted by male perpetrators, with both genders equally likely to be victimized ( $\chi^2(1, N = 617) = 0.94, p = .33$ ). Compared with heterosexuals (5%), nonheterosexual students (9%)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sexual assault victimization ( $\chi^2(1, N = 617) = 4.20, p = .04$ ). Regarding negativ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reported mo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both  $p < .001$ ) than did nonsurvivors; survivors also experienced posttraumatic symptoms. Among the 30 survivors who answered questions regarding help-seeking behaviors, 21 (70%) had sought help from classmates ( $n = 13$ ), friends ( $n = 7$ ), family members ( $n = 5$ ), or a partner ( $n = 1$ ). By contrast, only seven (23%) had sought help from formal support networks, such as their university or teachers ( $n = 4$ ),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s ( $n = 2$ ), or the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center ( $n = 1$ ). Six (20%) survivors had not told anyone about the event. Furthermore, female students and survivors were less willing to report future sexual victimization to their university or teachers (both  $p < .02$ ).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open-ended responses, we identified f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eges student willingness to report a case to their school, nam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 (12%), perpetrator's identity (14%), survivor's feelings (9%),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50%),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face (15%). For 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 most common inadequate reactions from the university includ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port the experience" (60%), "not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ype of experience" (53%), and "denying his/her experience in some way" (50%). Unlike in previous research, we observed little evidence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Institutional betrayal was unrelated to depression ( $r = .36, p = .052$ ), anxiety ( $r = .33, p = .08$ ), PTSD ( $r = .30, p = .10$ ), and willingness to report future assault ( $r = .06, p = .76$ ). Mor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Sexual assault is a serious problem for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Male students were equally likely to be victimized, which is at odds with previous findings (e.g., Conley et al., 2017; Hines et al., 2012). Most research in Taiwan has focused on female sexual survivor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ale survivors. The situation of nonheterosexual students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y face higher risk of sexual assault.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sexual assaults are significant, but survivors rarely formally report their case to the university. Creating a university reporting system with accessibility, confidentiality, trust, and fairness as well as improving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versity are urgent concerns. Much research is required on this topic.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periences were reported by the sexual survivors in this study. Even for those who did not seek help from the university, a hostile campus climate can cause a feeling of betrayal.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r help-seeking behaviors are unclear,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of survivors ( $n = 30$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evertheless be aware of these negative experiences and the feelings of sexual survivor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connec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in larger representative samples. The study had limitations. First, the survey used convenience sampling; thus, our findings cannot be understood to indicate the "prevalence" of sexual assault among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Second, we did not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perpetrator-victim relationship on sexual trauma. If the perpetrator was a teacher,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may result in more severe institutional betrayal and frustr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the impacts of sexual assault in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contexts. Third, this study did not conduct university-level analyses. The roles of campus climate and culture in a given university and how they influence survivor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nally, some respondents directly mentioned the word "face" in their open-ended responses. The fear of losing face may be a key cultural factor when Taiwanese survivors decide whether to formally report a cas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the impacts of sexual assault in different contexts as well as consider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e.

*Keywords:* trauma, sexual assault, campus sexual assault, institutional betrayal